

第一章 百日维新派自由 思想者康有为

第一节 绪说——维新派的基本思想

鸦片战争使中国士大夫自觉于商业资本的“洋务”，太平天国的革命使中国善于哭诉的农民自觉地独立活动于近代历史舞台。不论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或由下而上的农民战争，19世纪中叶的中国，是真正把近代的课题从内患外忧中历史地提出来了。所谓课题，是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然而问题最棘手的，是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化已经和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结成纽带，他方面19世纪以来的世界自由主义运动，从东欧经过俄国以至日本，复把资本主义的向上期结束而转入向下危机的发展之中，中国再没有可仿效的路径。甲午战争，便明白说明了中国落到日本维新之后，不可能跟着前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路线去追踪，而问题是反过来讲的，或者是前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中国，或者是落后的欧洲与前进的中国。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惟其如此，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政治社会运动，在短期的数十年间，阶段甚多，随着新的现实发展而有新的深刻课题，更有新的人类创作活动。民主主义者不断地适应新环境而贯彻民主方针，而改良自由主义者亦不断地在新环境急速的进展中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前者是正途，后者是歧路。

本节我们研究的维新巨子，康有为、谭嗣同、梁任公正是甲午战争以后的思想的一方面，他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迎接着从俾斯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良运动，企图中国的日本维新版出现。例如康有为说“臣请皇上以俄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们有昙花一现的鼓动中国复生的功绩，他们有前后矛盾而以矛盾自执的逆转，他们有“以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善变。他们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剧巨的历史变革中，常把自己应合潮流的暂时政策，绝对化而为先天的范畴。他们的政策和主义是同一的，如果按公羊家三世之说讲来，维新变法不过是一种手段，但他们把变法强调而为改制主义，例如廖季平就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康有为更大张变制与改制的绝对道理：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后世之穷而采用之。……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日本书目志序》）

“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应诏统筹全局疏》）

“董仲舒曰，‘为政不调 甚者更张 乃可为理。’……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上皇帝万言书二》）

天理、物理、政理、圣人之医理 皆曰“变”绝对的“变”甚至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即在“托古改制”，他的《改制考》一书，据他说是“不敢隐匿大道 而作 故大道之行 惟在一变。”

谭嗣同说：

“孔曰‘革去故 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缙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 不新 三界万法皆灭矣。’……孔曰‘不已’，佛曰‘精进’ 耶曰‘上帝国近尔矣’ 新而又新之谓也。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独可以居今之世，犹有守旧之鄙生，断断然曰不当变法，何哉？……夫孔子……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按即指康有为 曰：‘《论语》第七篇 当是《默而》第七 刘歆私改‘默’为‘述’ 窜入‘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十四字，以申其古学 篇名遂号《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 敏以求之者也’。生知与敏求相反相对，文义自足，无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语义都不连贯，是亦歆窜矣’。……×××曰：‘于文从古 皆非佳义。从草则苦 从木则枯 从草木则槁；……从文则故，从口则固；……从牛则牯，从广口则瘡，从水口则涸 且从人则估 估客非上流也。从水为沽 孔子所不食也。从女为姑 姑息之谓细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从也’。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辄动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日新乌乎本？

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仁学》卷上）

谭氏从圣教之旨（或公理）自然万法之义（孔子改制之道所引《论语》改误之说则为武断）文字学上的变化（所引从古诸字之曲解，更为背乎音韵学之常识），世界形势的存亡，证明一条原则，“变”“新”为常而已（后来谭氏死于六君子之国难，表面上和他冲决君臣网罗之伦理观念似有矛盾，而实不然。按他对任公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此话可信，他的心迹二者没有裂痕。因为维新派都是把主义与政策混同为一，自其甘死于政策上而言，可云徒死，而自其殉难于他的改制主义而言，则是戊戌变政的人物中最忠实的行道者，不可不辨。）

梁任公在《饮冰室集》首篇《变法通议》（丙申），开宗命义曰：

“法何以变 凡在天地之间者 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 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 大木大鸟，飞鱼飞翼，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迭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吸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自序》）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第一节》）

梁氏又有《说动》、《释革》二篇，申论前说，《说动》一篇言自然之公理惟动而已，圣贤之教旨，惟动而已。以至云有动力而日新其

法制则生存，否则灭亡，法制改革要如俾斯麦之艰难措置，而后国权可固。《释革》一篇言“革也者，天演中不可逃避之公理”，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大变革始。”所以他讴歌新法说：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灭国新法论》）

第一，按维新派的变之公理赞辞，表面上和他的保皇尊皇诸论不合，因在变之潮流中，君主亦应在被革之列，但事实上维新派则把升平之世归诸君主立宪。这是什么理由呢？第一，他们以为凡变凡新都是至善的，君主立宪是新的，故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这是形式逻辑的简单论断。以任公《过渡时代论》一篇之旨而言，所谓过渡并非目的地，然他把过渡时代形容为“变”之义最阐扬的时代，他说：

“其在过渡时代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力可贾与否，亦难逆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翥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蘼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过渡时代论》）

所以，由“变”之主义，产生了惟“变”之时代为美，悲剧的过渡时代才是真正的人类舞台，而彼岸则怀疑了。这和三世之说颇不相容，故公羊学派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急性的变法论，以为百日

可以推翻旧局（谭嗣同与袁世凯的谈话史料，如果实在，其中便在谭氏的意识中含着军事阴谋的急性改制观），三年可以定天下。

第二，维新派迎接的潮流是国权主义，在他们的文献中都盛道伸斯麦、彼得大帝、日本天皇，康有为变法运动，上皇帝的参考资料便是《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谭嗣同有咏赞俾斯麦之诗句，梁任公则将德俄日三国变法之史迹反复称颂于其文中。故 19 世纪行将结束的国权主义，为维新派所继承，康有为自述其生于英帝印度之岁，而年十余知伸斯麦之火烧法师丹也，怵然动发见《大同书序》。梁任公自述生于意大利建国之岁，都在生平上刻印上国权主义的纪年日月。凡国权主义的建国运动都含有与封建的妥协性，而急躁地谋一朝的翻云覆雨。任公论康有为云：

“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南海先生传》）

实则这是维新派的共通精神，亦无可讳者。

维新运动者大声疾呼变革以求活路的宣传，在当时是一把号筒，启发思想之功甚大，他们的自由平等思想虽然在保皇立宪的歧途中散布着，但进步的成分在朝气中，在浪漫主义的气氛中，是具有所谓“过渡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极其短促，所以他们之受批判而为时代所吞灭亦极其迅速，他们“变”之信条，就在现实的百日维新变法中，已经因为没有“质变”观念，而自己动摇，不能贯彻。任公说自己是思想界的陈涉，嗣同亦希望做陈涉、杨玄感，皆自知之明。

像康有为本来是一位“措天下如反掌”的现实论者，他的医术在过渡的时代中亦必绝对化为圣术，他把“改制”说成一般的天经地义。到了改制在民国初年逢到具体的问题棘手解决时，他又回

到国释论，而反对效法欧风美雨。自由主义的“特许证只许他们在这—政派与另一政派之间自由地飞来飞去”，尤其在甲午之战以后的中国历史，维新派更显得飞来飞去，不暇席暖的。有为以教主自居，故矛盾必须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暴露。任公谓“有为太有成见，……其学三十岁已成，不复有进”，只言其矛盾的思想体系，而其现实主张则不但太无成见，而且变来变去。至于任公，他自己说得颇为忠实，“启超……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

变法论当做绝对的改制主义去看待，必然要演出机会主义的政治色彩，公羊学派把孔子学说所以归纳而为托古改制的相对主义，把孔子所以尊崇为教主，都有其政治学上的目的。至于他们的孔教泛神论的假设，又有另外一种因素作为背景，那便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下面我们就要研究这一点。

按康梁变法以前的思想，在士大夫上层为“洋务”运动，在下流社会则为农民战争。后者的传统是被革命民主主义者所继承，即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前者的传统是被戊戌政变所继承。何谓“洋务”？即仿效西欧的交通、邮电、坚甲利兵等改革政策，在学术意义可谓之中国的重商主义。到了甲午之战以后，士大夫又惊赏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于立宪的政治制度改革，于是复倡变法运动。过去学者以为洋务与变法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洋务为仿效西法之富强，变法为仿效西法之制度，这是皮相的分析。著者认为，变法与洋务是一贯的重商主义之内容，二者不可分离，惟变法则企图以制度的动力而推行洋务罢了。（至于历史运动上的意义，另见下节。）研究思想史，不能不寻研本质上的分水岭，中国当时的民主派所以有其民主派的精神者，一在于民众性，

在于土地政纲，没有土地政纲的消灭封建独占之进步性，便要 and 自由主义者合流的。反之，维新派在言论上并没有一字提到土地政策，改良主义所以区别于革命，就在这里，而当时维新派所争的变法名词而反对革命的理由，都是策略的性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文献中所表露的思想。康有为在民国二年创刊《不忍杂志》，这时他的言论已失去戊戌时代的朝气，自己推翻了过去的变法思想实在惊人，而有一点则说出他的变法内容，他在《共和议》一篇中说：

“昔吾著三书，曰官制考，曰物质救国论，曰理财救国论，以为能举三者，中国既富既强矣，然后开国会焉，故一切自由平等之说，未敢发焉。”

按康氏在晚清时代，对于自由平等之说，虽未敢发挥民众性的言论，但并非没有鼓吹，例如他注《论语》，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关于“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把两个不字都认为今本衍字，为后人所妄改增者，旧本没有不字。姑不论“旧本”难据其为何本，但他所言则有自由平等的主观思想，他说：“政在大夫（不字衍），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议，则专制防民口之厉土为有道耶？”在他的言论中，把升平之世规定为君主立宪，自由平等是有条件的，但“民贵君轻”亦认为孟子传孔子的升平之说（还不是太平之道），何尝他未敢发自由平等的言论？然而，我们要知道，他虽然发此言论，而他的中心思想则别有所在，而他所云的本三著作，官制考、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则完全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内容，所谓升平之世，物质与理财加上官制改革而已。

西洋重商主义是和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泛神论相适应，因为世界市场使上帝亦下凡周游于新大陆与东印度，殖民地与基督教便相为结合表示出一种至尊的权力。康氏的孔教论，和他的理财救国论相为表里，任公云“有为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侔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讖纬之言以实之”，此话最确。任公又约康氏的孔教观为六大纲：“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这话则带有教条的宣传性，主观上企图输入西洋的宗教改革于中国，如任公所谓“论近世政治学术之进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业，为一切之原动力乎？后有识者必能定论此案也。”他便以康氏为“孔教之马丁·路德。”（参看《康南海传》）康氏的宗教思想之定论，即在他以为景教为治强之本，任公已经破案一半，而其他一半则所谓“治强”不是别的，亦即重商主义时代的理财立国，而康氏所谓升平之世者。因为康氏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把事物和事物的影子常颠倒重视，重商理财是事物，而景教的权力是影子，他崇拜影子要比崇拜事物还利害。故又如任公所云“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这又夸大了重商主义时代统一运动的外貌。

西洋重商主义时代的“价格革命”，是近代文明的一有力要素，而购买力的奢风，则为重商主义的现象形态。康氏对于这一文明亦心向往之，他解释《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云：

“……世愈文明，则尚奢益甚。……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义，……令人道退化，今中国之文明不进，大损所关，岂细故哉！”

康氏重商主义的思想，更有他的主要言论，例如：

“新政何以举行 闻日本之变法也 先行纸币 立银行 财泉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大购铁舰数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应诏统筹全局疏》）

甚至他在上疏中 把新政与商务混同一致 如云：“新政多下总署 总署但任外交 岂能兼营商务？他在《万言书》中又举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 曰铁路 曰机器轮舟 曰开矿 曰铸银 曰邮政”。内容则详论商业者占全书之半，并主张：

“特设通商院 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 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 庶几振兴 下言商学商会之重要 文繁不引）”

康氏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更大倡商业救国之论，运动华侨，创设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华益银行、纽约琼彩楼餐馆、上海广益书局、广西太平山金矿公司等等。在美洲致公堂新章要义中（此文据冯自由云为中山先生手订），曾揭发了康氏的运动：

“官爵也 矿务也 银行也 商务也 学堂也 皆所以 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

任公在《康南海传》中第八章《康南海之中国政策》中 列有十二项，第六项以前为立宪政策，自第七项以后则全述其商业救国之论，例如：

“第七，先生谓中国当以工商为国事，以天产之富，工价之廉，而其人精于商务，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奖励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国之雄甲天下。”

“第十一，先生以为今日中国无取多兵，何也？若能立宪法、改官制、行真维新 则内乱必不生。……泰西各国，专务商

业 咸愿平和 苟外交无失 内治日兴 谁则开衅 ?”

所以，维新运动，是以官制的改革为手段，而达成“专务商业”的目的，此目的在第七项中说明得最扼要。这比洋务运动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增加了立宪法改官制的推动力，丝毫没有民主派的土地政纲内容。

梁任公的言论比较广泛，他以改革政体与办学校为变法的原动力，批判洋务运动之不知所本，表面上好像是洋务运动的扬弃，但骨子里则为洋务运动的延长。他说变法的潮流，变亦变，不变亦变 自变者为日本 可效法的 他变者为印度、波兰、突厥 不可想象的 参看梁氏著《变法通议》。效法日本，惟在立宪与学校，故他特注意于“政学”与“艺学”以二者推行富国强民之道 所谓国权主义的商业立国精神。例如他说：

“今英旗所翻 遍大地之海岸 威权炎炎 炙手可热 游于海外者莫不艳之。岂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会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此人子之职也 尽瘁于海外 以张国权 此国民之职也。我数百万之同胞 何多让焉？”（《商会议》）
任公商业救国与国权主义之论颇多，今举其所赞述的德国伸斯麦宰相为例如下：

“德人之帝国主义，由俾士麦商业政策一转而成，其目的在以国民主义为基础，而建一工商业帝国于其上，使充盈横溢之民力，得尾闾以蓄泄之也。”（《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任公后来虽然放弃保皇保教的思²⁵¹⁹，但他又向“国民力”的国权主义方面寻求出路，其思想脉络，仍在重商主义的范围内。他虽然介绍许多民权的学说，而他自己则把民权划在国权之下，继承洋务衣钵。戊戌政变后之四年，他写的《新民说》已经不强调君主立宪，而走入国家主义一途径，惟所论“新民”的道德基础，如国家思

想、自尊心、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尚武、私德等，以“国民之竞争”⁷⁸为内容，犹是国权中心的思想，犹是主张由制宪以兴商务的思想。

他说：

“征诸商务，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商务之整顿，夫人而知之矣，虽然，振兴商务，不可不保护本国工商业之权利，欲保护权利，不可不颁定商法；仅一商法不足以独立也，则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有法而不行，与无法等，则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于无法，则不可不定立法权之所属；坏法者而无所惩，法旋立而旋废，则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立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今之言商务者，漫曰，吾兴之吾兴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兴之者持何术也！”（《新民说》）

由此看来，所谓立宪，乃振兴商业的手段。它不是和反封建的民主纲领相配合，而是和商业第一相配合，所以“新民”云者，即新其商务之民而已。任公在基本理论上和康有为是一致的。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以后来不谈伪经，不谈孔教，与康氏分家，这当是一部分事实，然而他所谓“渐倡排满共和之论”，其基本立场，犹是戊戌的传统（任公在民国五四以后的思想，非这里范围，当别论之）。

谭嗣同的“仁学”完全基于商业交易 他说：

“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故莫仁于通，莫不仁于不通。”（《仁学》卷上）

自由贸易的世界，在嗣同理想中是仁爱的合理关系，所谓“彼以通商仁我，我无以仁彼，……是以不仁绝人之仁。”（同上）这种理论，比亚旦斯密斯还要绝对。所谓仁者，如商业上等价交换的关

系，一方面是出卖者，另一方面是购买者，此方的相对的价值形态与彼方等价形态，互为作一物对他物之换位，在最单纯的关系（如物物交换）表现着互利的样子。嗣同以为这便是通乎人我之仁，故谓“彼仁我，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财均，而已亦无困矣。”（同上）然彼我之间，最初与最后并非一致的，如果彼我皆以商品所有者出现，那么人的关系之外，便产生了物的关系，⁴⁶即商品的拜物教关系，货币关系以至资本关系。这在嗣同哲学中都以为是“上天报施之理”，所有者拿出商品来出售的“仁”之施，非所有者拿不出等价物来购买便失去“仁”之报，而所有者应当生存，而非所有者之“翦灭屠割，揆之上天报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这已经是奇妙的理论，他把这一理论又用之于国际贸易，以为通商是彼此惠仁，资本商品的输出国与殖民的输入国，好像只有等价交换关系，没有交换以外的不平等关系。

他在《仁学》中规定，企业家的出现是仁者的博施济众，则“为仁即富”便成了维新派的市民思想，而无所谓“为富不仁”的道理，偶有之，亦如他所说由于“坐拥厚货者时有偏心”之偶然现象罢了，好像是说不肯再投资本以扩大生产而已。因之，推而至于国际通商关系，商品输出者“不啻出货佣彼而为我服役”，愈来货愈现出其仁心，而我若拒其输入，他说：“不自振奋，而偏巧于推咎，情者固莫不然也，是以仁绝人之仁。”这是多么深厚商业心理的公羊学！

嗣同崇拜商业国际为“仁”的人我通，这是商业理想美化的讴歌，然而又不妨碍他另从一方面相反的角度来雄化商业，歌颂商业。例如他说：

“西人虽以商战立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

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原注 西人……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上欧阳瓣薑师书·二》）这已经批评了他自己的《仁学》，《仁学》主人我通以通商为仁，此处主人我战，以商抗商，以不仁对不仁。惟他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商业资本主义是王霸皆宜。而矛盾的地方，他很轻易地拿两个天理来解决。

严复亦与维新派思想相通 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

“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乎理财、经武、择交、善邻；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

这所谓“标”者，即重商主义，且标本二者有急缓之区别，故“标”即变法时代的“本”了。

第二节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

晚清的富国强兵之商业资本运动，从中兴大臣的新政洋务开始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渐次走上交通工业与军用工业的道路。曾国藩于同治元年（1862 年）即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其后同治二年（1863 年）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治三年（1864 年）在南京设立了金陵兵工厂，同治四年（1865 年）在上海设立了江南机器局，同治五年（1866 年）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同治九年（1870 年）在天津设立械器局。同治十年（1871 年）倡议在大沽筑新式炮台，同治十一年（1872 年）五月倡议开采煤铁矿。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招商局成立。光绪元年（1875 年）举办铁甲兵船。同年申请在各省分设西学局，派通晓测算、舆图、

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各科，通晓时务大员主办。光绪二年（1876年）在四川设立四川机器局，光绪六年（1880年）购买铁甲兵船，同年在南北洋设立电报局，又奏请建筑铁路。七年（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同年国营商船初航英国通商，招商局接办各省电报。八年（1882年）在旅顺建筑码头，同年成立金陵火药局。十年（1885年）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十三年（1887年）开办漠河金矿，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十九年（1893年）汉阳兵工厂成立。

复次与军事工业交通工业相伴而产生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织布局，九年（1883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设源昌机器五金工厂，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东设立缫丝局，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立织布局、炼铁厂。十六年（1890年）上海纺织局成立，官商合办。十七年（1891年）上海道唐淞岩设上海机器纺织局，官商合办。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设立武昌织布局。二十年（1894年）盛宣怀招集商股八十万重兴洋布局，因资本不足，改设华盛纱厂。同年上海成立裕源纺纱厂。故在中日甲午（1894年）战争以前二十年之间，中国的官商合办轻重工业开始生长起来，同时在上海、武昌、无锡、宁波、南通等处更渐产生了商营的轻工业。这样的工业，又招致华侨投资的内向心。

以上两项工业是戊戌政变以前中国的产业向近代历程走的痕迹。我们先讲后一项所谓当时的民族工业。它的最大特点为官商合办，而真正商营的企业尚看不出它的力量。这里所谓“官”者，正是满清的封建因素，故新兴的民族工业不可能让它比封建政府的自觉更跑得快些。这里一方面是封建贵族的所谓让步，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家反而跟着官僚势力的尾巴去进行，因此在中国 19 世纪末

叶的国营、商营问题，成了严重的矛盾（辛亥起义导火于川汉铁路之国营、商营争执）。这反映维新派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即他正是企图在宫廷维新的基础上做近代的历史变革。因为甲午战争以后，虽这样的萌芽工业也被外国的资本所摧灭了，这不能不使有近代意识的康有为发生保国会的运动，其所谓“保国民”、“保人民之自立”者亦就有了说明。

第二，我们再讲第一项工业。在这30年之间，中国古老的封建地基上居然产生了军事交通工业，这样的工业，总算使不动的社会往前进了一步。然而这更与第二项工业有别，更难代表中国近代工业的划时代的兴起。要答复这个问题，应看甲午的中日一战就知道的。

一、这些中兴名将所进行的官僚机构之下的洋务，在建立过程中是由办差的形式出现，工厂组织的体系变成了衙门。

二、资本的来源是为所谓官僚式的军备工业所支配，没有人民性的基础，这种由封建朝廷所凑集的资本，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正确性，西太后的颐和园便是动用了北洋海军的专款来建造的。

三、洋政是用国库来支持的，在开销国库支出的用途上，遭到了当时满清的政治积病，一方面想从事于新政，他方面又不敢从事于新政的彻底，只是在外力影响下，不得不畏首畏尾地作为新的点缀来进行。

四、洋政之下的工业，在支配当时的满清贵族心理上、主观上是不愿意的，在一般顽固的道学或守旧大臣的意识中，是把它当做了一种荒唐的怪物去看待的。例如理学家的一位大臣就说：

“同治六年正月，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由满汉之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公奏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

求诸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无论所学未必果得，即使有所成就，不过术数之士。……所恃读书，可维持人心。今后举聪明俊秀……使之奉夷人为师，而读书人已为所惑。……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伏望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阴患！（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

所以李鸿章在当时不能不讲出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他说：

“疆臣竭心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与刘铭传书》）

“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尤须有治人。……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与陶模书》）

新政是在腐旧的清廷专制政治之下，委曳而进，实行的结果，只是暴露了封建政治的矛盾与无力，只显出“中学为体”者之空虚而“西学为用”者之怀疑，没有解决问题，仅把问题的严重性扩大了。

但新政又在另一方面表示了封建官僚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畏惧，以及对于封建的留连。因为新政的提出，固然是代表了二元的体用观念，即恋心于旧的而震骇于新的，但旧的却拉住新的。尽管如此，问题则不能不当做一个严重的历史课题提出来，只要能够提出时代的问题，即令在解决问题上是如何的不彻底而有阻扰，但至少表示封建内部自己对于自己的失却信心，故新政是成了近代社会的催生剂。

新政的军事交通工业，试于甲午战争而由残酷的历史所批判，朝野都在马关条约的签字上束手无策。在中国民主运动尚未成长的当时，问题便由中兴大臣的新政转向而为举子士人的变法，在内